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与交往形式研究

姜锡润 王燕

[摘要] 有些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范畴是后来的“生产关系”范畴的雏形。其实，“交往形式”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宽泛的概念，“交往”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形态》中的“交往”和“交往形式”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范畴，不应与生产关系范畴相等同。

[关键词] 交往 交往形式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范畴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其雏形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945年合著的《形态》中就已形成，即“交往形式”范畴。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二版的编者，他们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用不太确切的术语来表达的，后来他们用比较确切表达了这些新概念的另一些术语代替了这些术语。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1](出版说明第3页)此外，他们在《形态》正文后面的注释4中也表述了相同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form》，《Verkehrsweise》，《Verkehrsverhä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1]（第697页）

实际上，“交往形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关系”，它在《形态》中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要理解《形态》中“交往形式”的涵义，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界定“交往”的。

一、交往和交往形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主体间性哲学。他区分了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工具性行为是以成功为指向，以合理谋划为特征，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而交往行为（相互作用）却是以达成理解 and 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和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忽视了人类交往行为的作用，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人于人的“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混淆起来，抹杀了经验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才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所以，他主张用交往方式取代生产方式，用“劳动”和“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并未出现“交往行为”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忽视了人类交往行为的作用。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形态》的第一章，就可看到马克思一再地使用了“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范畴。

当然，马克思的交往概念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涵义十分广泛。“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 ..”^[1]（第41页）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类活动整体划分为人对自然的作用和对人的作用。人对自然的作用，即生产和劳动，而对人的作用正是“交往”的本质含义。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写到：“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2]（第478页）所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甚至“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1]（第26页）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基本上是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畴。

其次，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个历史范畴。在现实世界中，“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第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1]（第74页）在批判费尔巴哈时，马克思说：“他（指费尔巴哈，笔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第48页）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是在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所说的交往并不包括人们在生产中的互动和关系。在他看来，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的协作也是一种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所以，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与生产方式无关。

另外，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只是交往的媒介，“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第34页）而在哈贝马斯处，语言被提高到本体论的地位，他认为，交往行为实际上是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言语行为”。

从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3]（第176页）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所涉及的广阔领域说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具有巨大的思维空间。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深化交往理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可资借鉴的重要内容。

在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范畴后，就不难弄清“交往形式”这个被传统马哲史界定为“生产关系”替身的范畴的涵义了。

首先，“交往形式”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范畴。“每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第43页）此处的“交往形式”不仅包含着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着更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此处的“交往形式”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次，“交往形式”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指“交往形式”，笔者注）的历史同时也是发

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第81页）由此可知，一定时期的交往形式乃是先前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是以生产为前提条件而展开的人们交往实践不断深入和拓展所积淀而成的。

从以上对“交往形式”范畴的粗略考察可知，“交往形式”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往这两种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积淀起来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规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可见，“交往形式”范畴超越并涵盖了“生产关系”范畴。

二、“交往形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关系”

如前所述，“交往形式”在《形态》中的含义相当广泛，它包含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学者会把《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概念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呢？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和苏联赋予“生产关系”这个概念的含义来自斯大林模式，而不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模式。哈贝马斯说：“1938年，斯大林编纂、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所采取的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后果，以至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理论框架内。斯大林确立的这个理论变体需要加以重建。”^[4]（第13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写成《形态》一书，却在1932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出版。此时，理论界已接受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而且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学者们习惯用后来的“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来解释《形态》中的“交往形式”等范畴。传统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把《形态》中马克思一再使用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仅仅当作“生产关系”范畴的最初表达，把交往消解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交往”概念所蕴涵的广泛意义。

在《形态》中，“生产关系”也有单独出现的情况。“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指封建时代的农奴劳动和自身劳动，笔者注）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1]（第28页）又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法同物质关系时说：“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于生产关系的依存性。”^[1]（第420页）“直到现在存在着的个人的生产关系也必须表现为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 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1]（第421页）但“生产关系”在此时仅仅指向现实生产中的人们的物质关系，是一种工业关系。这与后来特指经济基础意义的“生产关系”相比，仍带有狭隘的性质。

虽然在《形态》中，“交往形式”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范畴，而“生产关系”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过程中却因此找到了“经济基础”概念，这是毋庸置疑的。

马克思在用“交往形式”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本质的时候，就是将“交往形式”作为经济基础来理解的。“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第40页），而“这一名称（指市民社会，笔者注）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第41页）唯物史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第42页）这实际上就是在“交往形式”中离析出一个“经济关系”，从而为狭隘的“生产关系”向真正的经济基础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转变作了伏笔。

而马克思正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完成了这个转变。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逐渐扬弃了原先对“生产关系”所作的经济学上的狭隘理解。蒲鲁东在《哲学的贫困》中经济范畴出发来构建人类历史，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5]（第139页）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等同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5]（第145页）正是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才真正摒弃了原先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并强调“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5]（第144页）这个统一整体即是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中阐述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环节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此时，“生产关系”这个哲学范畴已经成熟。

从上述分析，可知：“交往”与“交往形式”在《形态》中是两个有独立意义的重要范畴，它们在创立唯物史观和促进社会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三、“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作用

“交往形式”作为一个独立使用的范畴，在《形态》中首先提出并逐步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唯物史观正是在“交往形式”这一基础范畴上建立起来的，它是理解人类史的钥匙。

首先，马克思用“交往形式”分析了人的本质。

青年黑格尔派把人归结为宗教的人、抽象的人，所以他们认为人们只要同意意识的幻想做斗争就足够了。但是，“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从宗教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但连这些说明也是片面的”^[1]（第23页）与此相反，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第30页）在这里，马克思是把人的现实交往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这些交往形式当作科学地界定人的本质的基础，他指出：“每一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第43页）

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说明是一致的。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第5页）在这里，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由此可见，“交往形式”是马克思科学地界定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

其次，马克思用“交往形式”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本质。

“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第40页）“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交往。”^[1]（第41页）这个“市民社会”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决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来实现的。这是因为，若人们的分工发生变化，那么人们在生产、交往中的物质关系、经济组织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国家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而，要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由上述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个人生产的物质交往形式。因此，“市民社会”虽然不是马恩所特有的哲学范畴，但不能由此而否认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这就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一样，尽管它们在马恩之前就已被法国的历史学

家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作过分析和研究，但不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范畴。同理，“市民社会”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它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一样，是构筑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理论基石。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说明了他的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1]（第42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交往形式”范畴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四、“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交往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是一种信息的流动，这也是“交往”最主要的特征。作为传承文明的媒介，交往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变革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1. 交往的扩大是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前提

“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第24页），所以，“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第61页）马克思接着以腓尼基人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为例来说明。马克思在谈到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1]（第62页）最好的例证就是：“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1]（第64页）

由此可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1]（第24页）所以，交往的扩大，是生产的扩大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哥伦布远航美洲，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以及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因其拓宽了本国与其它各民族的交往范围，使交往具有了世界性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相反，若一民族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就有可能导致该民族的停滞、衰落，甚至灭亡。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写到：1877年绝种的塔斯罗曼尼亚人，为什么会落在别的民族后面整万年呢？当初的塔斯罗曼尼亚人一到了他们家里以后，立即和外面的世界断绝往来。他们自己和他们最近的乡邻澳洲人全部没有可以促进交通的船只。拿这个和历史上的任何复杂文化比一比，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们前前后后接触过的异族不知其数，而塔斯罗曼尼亚人接触过的简直等于零。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强。^[6]（第13-14页）

2. 交往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

“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第79页）马克思在前面所举的关于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例子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日益先进的交往手段和逐渐扩大的交往范围，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产生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这个革命的阶级自然就会带领大众推翻没落的统治阶级，建立一个与现存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一个新阶段”。^[1]（第64页）

因此，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不断扩大交往，因为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联合起来，进行社会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3. 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它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1]（第39页）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在此基础社会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使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社会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意义上才可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第40页）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拓展是形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这一基本条件，带着良好的动机和愿望建立起来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因而也是封建和空想杂糅交织的不伦不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说：“不这样，（1）共产主义社会就只能作为狭隘的、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接着，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第39-40页）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现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清朝末年，正是由于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才被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而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不到三十年的短时间内，便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没有加入WTO，因此与世界经济接触只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没有真正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去。现在我国终于成为了WTO成员国，这就加深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深度、广度和确定性，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各种资源配置、面向国际市场，并且能够保持与世界经济的同步发展。加入WTO，意味着我们将告别过去，即告别作为东方大国的区域性存在的过去，在多极化时代成为有着独立意义的全球中的一极，从区域性交往走向遵循全球通则的交往。五千年前，中华民族作为炎黄子孙走向了历史的大融合，造就了东亚文明的辉煌；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加入WTO，中华民族必将造就更大的辉煌。

（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陈筠泉、刘奔主编：《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哈贝马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6] 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